

试论宋江人格中的多种异质文化冲突

邵子华

(菏泽学院 中文系, 山东 菏泽 274015)

[摘要] 宋江身上潜伏的人性极为复杂, 具有塑造多种人格的潜质。他广泛、充分地吮吸了我国文化中的多种异质成分, 并通过功利性的文化选择来完成他功名利禄的自我实现, 从而形成了他性格特征鲜明的多面性和强烈的悲剧性。

[关键词] 宋江; 人格; 异质文化; 人生悲剧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5)01-0087-04

On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e Conflicts in Song Jiang's Personality

SHAO Zi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Heze University, Heze, Shandong 274015 China)

Abstract: The latent humanity of Song Jiang is extremely complex, and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of shaping multiple personality. He extensively and fully absorbed a variety of heterogeneous components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completed his self-realization of fame and fortune through utilitarian cultural choice, thus forming his distinctive multi-faceted character and life tragedy.

Key words: Song Jiang; personality; heterogeneous culture; life tragedy

《水浒传》中的宋江一生大起大落, 曲折离奇。虽然他总的人生目标是一以贯之的, 但各个阶段的目标和为达到这个阶段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却是各不相同。概括地说, 依据宋江阶段目标和采用手段的不同特征, 宋江的一生可以分成四个明显的阶段: 义士, 盗魁, 忠臣, 奴才。上梁山之前他是个仗义疏财的义士, 标志性的事件是“担着血海似的干系”私放晁盖。上梁山以后是盗魁, 标志性的行动是公然率众抢劫府库。接受招安以后是朝廷的忠臣, 把“替天行道”改成“顺天”“护国”, 北战南征, 戮力杀敌。他的结局是个悲剧下场, 最终成了奴才。四种反差很大的角色集于一身而又杂糅渗透, 就使得整个形象斑驳陆离, 甚至难以分清哪种才是主色调。

但不论何种选择, 最终都是他人格主导下的社会行为。宋江一连串的行为组成了一场回响不绝的人生悲剧, 其悲剧根源在于他人格结构中对多种文化因素的功利性选择及其发生的扭曲和冲突。

为了清楚地认识宋江人格的文化结构, 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他的人性基础, 因为人性是确立某种人格的内在或潜在的基础, 人格是人性通过人的行为选择的现实化的结果。一个人具有何种人格, 虽然受制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 但主要的还是决定于他人性中的潜在自我经由何种方式变成现实的自我。

在对人性的认识中, 持善恶二分法、三分法的都有, 其中三分法认为人性包括由自然属性、主体性和反主体^[1], 或者人性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的^[2]。对人性的三分法揭示了人性的复杂, 也能够反映人性某些方面的真实——许多对立的因素统一于人的生命结构的整体之中。但对于宋江来

宋江的人生道路是他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

收稿日期: 2014-40-29

基金项目: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水浒》人学研究”(J13WD06); 山东省“十二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菏泽学院“水浒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邵子华(1959-)男, 山东单县人, 菏泽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对话诗学、水浒文化。

说,采用人性三分法虽然可以用来说明、揭示他部分行为的原因却不能说明他的全部行为。比如,宋江对自身的自然属性控制极为严厉,虽然他在吃、性和银子等方面也有一些出自自然欲望的表现,但他对此极为克制,与其他所谓江湖好汉截然不同。宋江渴望青史留名,是主体性极其鲜明强烈的人,但是,他残暴杀人的反主体性的行为又常常和他的主体性追求结合在一起。许多情况下,反主体性行为反倒成了他实现主体性愿望的手段或方式。宋江人性的复杂纠结超出了现有人性理论的边界。比如,用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范畴来解释宋江: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来是三个不同的层次,但在宋江的行为中却高度统一。他的本我、自我总是以超我的面目出现,他的快乐原则完全服从现实原则,而他的现实原则又能不动声色地转化、装扮成完美原则。宋江一生自始至终,他作为“本我”的野心和强烈的反抗性深藏不漏——只在醉酒和梦靥中才流露出一丝一缕而还没有人能够明白——能够参透宋江本我和自我的只有吴用一人而已。宋江作为“自我”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完全被他“超我”的全忠仗义掩盖了、转化了,都成了他为追求全忠仗义的理想所自觉经历的艰难坎坷,这是宋江成为光彩照人的英雄人物的最为真实的根本原因。

宋江身上潜伏的人性极为复杂,具有塑造多种人格的潜质或内在规定性。由于他广泛、充分地允吸了我国文化中的多种异质成分,通过实行功利性的文化选择来完成他的自我实现,从而形成他性格特征鲜明的多面性和强烈的悲剧性。

二

我国文化的主要成分是儒道释三家而以儒家为主流。也有人认为:“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闻一多将“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3]这些意见都从某些侧面揭示了我国文化的真实存在,说明我国文化的丰富和繁杂。宋江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他对这些丰富、繁杂的文化的接受并非平分秋色,而是作了为我所用的功利性选择。各种文化在宋江都只不过是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绝不是精神家园或灵魂的栖息地。

宋江思想中接受的是儒家而对释则无所用心,但他遵循的儒家思想却并不纯正。儒家思想虽然具有丰富性和多面性,但其本质是“仁”。仁者爱人,这是儒家做人的最高的道德原则。宋江“仁”吗?从他遍施银两、抗敌平乱,从他“到任之后,惜

军爱民,百姓敬之如父母”^{[4]1464}来看,他是个仁者。但是,从他为了逼迫秦明投降而大肆屠杀无辜百姓,为战胜田虎水灌太原城来看,宋江非但不仁而且极为残暴。他为赚得朱仝唆使李逵斧劈四岁小衙内的行径“鹤泪猿悲”,令人发指。

当宋江知道自己饮下朝廷的毒酒必死无疑的时候,他亲手鸩杀了李逵。宋江为什么要毒死李逵?宋江自己心里想的是李逵“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当面对李逵时说的是:“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4]1465}这是有差异的,差异在于究竟是“我的清名”还是“梁山之名”,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其实并不难看出,在宋江的心里,好兄弟李逵不过是他沽名钓誉的工具而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别人的生命可以作为他的工具任意使用,这与他到处施舍银子的时候判若两人,差别迥于人兽之遥。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宋江灵魂里最高的人生目标是深受儒家影响的,他志向远大,建功立业,但可惜的是,他扭曲了核心的仁。他要通过忠君来实现荣华富贵和清名流传。因此,他在行动中就把儒家思想中遵守等级秩序的忠君推向不辨是非的极端,把儒家人生态度的积极用世、百折不挠地贯彻到他人生艰苦卓绝的实践并最终异化为执迷不悟、不择手段的偏执狂。

至于道家,在宋江眼里只不过是个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工具而绝不信奉它的主张,他所用的只是道家的法术而并不实行其清静无为的大道。虽然他的梁山将中有道家的信徒,在作战中也运用道家法术克敌制胜,甚至于他对名山高道也毕恭毕敬,但在精神上仍是两个道上跑的车。宋江是儒学为体道学为用。他用一团火球一块石碣这些道家惯常施行的把戏,轻而易举却又深入人心地为一百八将排好了座次、规范了秩序。宋江的信仰选择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水浒世界里连皇上也沉迷道教以至宋代一朝都十分盛行而他宋江却偏偏不信。他信奉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宋江对墨家也是这么个态度。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和非攻,兼爱在宋江仗义疏财的形式上还有所表现而非攻却是不能践行的。墨子提出的“三表”宋江何曾做到?(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见《墨子·非攻》上)

至于匪,做土匪决不是宋江的人生目标,但他却热衷于广泛结交山寨江湖,认匪为友,采用土匪的手段,甚至落草为寇。宋江在他那个时代是个另

类,他功名心切却没走科举道路或者没有走通,他遂凌云志的途径就只有“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第三十八回写宋江在浔阳江楼上独自饮酒,感恨伤怀。金圣叹对此大不以为然,批宋江心想“倘若他日身荣”道:“公欲以何科目出身?”金圣叹对宋江的心事隔膜得很,看不明白宋江“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成为“顺天”“护国”、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资本和决定性的力量。“梁山泊近来如此兴旺,四海皆闻,曾有人说道,尽出仁兄之赐。”^{[4][41]}这些都完全是在宋江的运筹之中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宋江成功地开辟了由江湖走上朝廷的人生之路,这是另一条充满血与火的终南捷径。

如果我们能够沿着宋江在各种不同人生情境中行为细节的指引走进他的内心,会发现他的灵魂里最活跃的是儒家面具下的纵横家和法家,他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有选择地接受了法家和纵横家而为其所用。

法家讲势、法、术。势是必须服从的绝对权威,法是为达到某种目标而订立的办法、规章之类的强制性制度,术则是控制其臣下的技巧,所谓御人之术。宋江以仗义疏财扬名江湖成势,以义、忠和天意为梁山立法,而他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登峰造极的是“术”。“术不欲见”,潜藏胸中,择机使用。宋江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一行一动皆是术,细致缜密,浑然天成。他知道你的梦想和恐惧,你最想要的和最不想要的是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宋江收服人心是在利害之间驾轻就熟的运筹,很少有人能逃脱他似乎不经意间织成的罗网。“宋江每得名将,必亲为之释缚、擎盏,流泪纵横,痛陈忠君报国之志,极诉寝食招安之诚,言言剜胸臆,声声沥热血。”表面看似是喝退手下、亲解其缚、谢罪、好言、敬酒等等一脉相承的套路,其实不然,他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劝关胜痛说忠义,降秦明许以美女,招索超说“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还有的虚言让与董平寨主之位或实实在在的给呼延灼来一个伏身下跪;而收彭圯宋江并不讲替天行道,只跟他讲“活命”的问题,因为宋江看清了彭圯贪生怕死的本性,给他砌好通向生路的台阶。采用哪一种策略侧重于哪一个方面,不在于宋江的心情而在于他所面对的人的身份和心性。宋江的权术攻心为上,他能给你在世道人情中的优劣处境准确定位,能瞬间抓住、利用你的弱点。

宋江对纵横家的选择也非常明显。纵横家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长谋略。他们朝秦暮楚、无所不入、追逐荣华,能够在最艰苦的人生环

境中坚持不懈,虽身在江湖之远却心在魏阙之上。宋江把纵横家的人生本色转化为自己的人生手段。他极为擅长揣摩之术,深察对手内心的种种表演和筭路蓝缕、矢志不移的目标追求,能够充分证明他身上具有鲜明的纵横家的精神气质。

三

宋江灵魂中对我国丰富文化功利性的选择接受决定了他人格的复杂和矛盾,他的复杂在于他功名心切、精于权术和精神的悲剧性,他的矛盾表现为他所实行的忠和义的矛盾、手段和目标的矛盾以及功勋卓著和下场悲惨的巨大反差。

宋江所接受的不同文化本身就存在着异质的对立冲突,种种异质的对立冲突在内化为他的人格价值取向后,又支配着他的身份和行为在民间、江湖、朝廷三个世界转展游走。他不明白这是三个已经撕裂、对立的世界。宋江以广施钱财的方式在民间聚义,他的疏财代表的是民间的愿望。他又以义在江湖聚力,横行江湖公然成为另一社会的头领。当他以义为资本集结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有步骤地把义转换为忠,实现从江湖向朝廷的跳跃。宋江全然不顾林冲被逼家破人亡的血仇大恨,他不杀高俅百般讨好高俅,使梁山反贪官杀奸臣的旗号成了幌子,也使宋江的义大打折扣并因此而蒙羞。他不懂高俅等人当道行奸的根源,他不明白高俅、赵佶等人原是一丘之貉,他以为自己的忠可以救国。他想以忠义来缝合民间、江湖、朝廷三个世界,终至于背叛了义也迷失了忠。宋江深陷在忠于朝廷却伤害兄弟情谊的矛盾中,这显然是因为他被功名所驱使,是他的私心在作祟

宋江人格中多种文化因素的矛盾冲突造成了他内心的痛苦。虽然他把真实的自己埋藏得很深,但是,作者还是给我们描写了深入宋江内心世界的幽径。宋江随机腾挪变化的言行,醉酒后的诗词和频繁出现的梦境,可以让我们分明、真切地感受到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宋江在浔阳江楼上写下的两首诗词吐露了他的真心。宋江写罢自看了大喜大笑,这“大喜大笑”发泄的是心中早已堆满的怨毒。没有具体的对象,或者说怨毒的对象就是他自己。这是一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志难酬、报国无门者常有的愤懑心态,是一个人的才能志向被压抑、强劲的生命力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宋江对自己攻经史、学成吏又结交了许多好汉的才能和资本期许甚高倒也符合他的实际,可是,他却深陷图囿,刺面成囚,虎落平阳,落拓凄惶。宋江的心事在“他时

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可惜金圣叹竟觉得“写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他为何,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

宋江在他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披肝沥胆、一路狂奔,然而这条道路却异常凶险。这种凶险不仅来自于江湖和朝廷等外部世界,也来自宋江本人的内心世界。宋江跟晁盖、林冲等人一样,多次言说自己犯下弥天大罪。既知是犯罪又决然而行,这是一个生存的深刻悖论。宋江所选择接受的文化导致了理性判断与感性行为的冲突,这是人性中正负两种不同质的冲突。他要采用自以为“犯罪”的行为来实行对生命正当欲望的满足。宋江热切希望跻身朝廷的愿望是可以分明感受到的,但他内心时刻痛感被压迫的苦难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这种压迫是发生在他心灵深处的精神的压迫,一种他无法逃避的带有暴虐性的倾向规范着他的行为。繁杂、矛盾的文化精神浸透并钳制住他的内心,他已经失去精神的自由而必须屈服于他晦暗迷茫的偶像。压迫和屈服同时存在于宋江的人格结构中。他真正的精神结构并不像他的外表或行动一样是稳重的。如果我们仔细一些,会看到他内心的慌乱和寞落。

宋江人生悲剧的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宋江是民间和朝廷的双重代表。他民间代表的身份得到普遍的认可,而朝廷代表的身份却备受质疑,但是,他确实心甘情愿地代表朝廷的利益为那个社会制度而战。宋江悲剧的性质在于民间和朝廷的对立冲突,更在于宋朝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应该相信了而他还坚信不疑。所以,在历史的进程中,他悲剧人物的角色是注定的了。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宋江吸取了我国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成分杂糅于一身,如儒家的忠、法家的术、纵横家的智、江湖的义以及民间的情。这众多的文化因素当初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为解决不同的社会人生问题而提出来的策略,它们本身都具有深刻的局限性,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尖锐冲突,而宋江拿来为己所用的时候又把它们作了自我功利选择的扭曲。因此,这些文化因素在赋予宋江横行江湖的大智慧以外,并没有给他提供安置灵魂的精神的憩园,他的精神一直处于道与术分裂的紧张以至后来的危机状态。

从性格上看,宋江所标榜的忠义,所热心追逐的功名,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既符合人间的伦理道德也是人性正能量的发挥,应该属于积德行善和利国利民之举。但恰恰在这些都是合理的因素之间却存在着必然性的冲突,任何一方都有片面性,必然由一方损害另一方。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宋江性格中矛盾的各方不能通过冲突以某些因素的毁灭来显示“理念的客观必然性”或者“永恒正义”的最后胜利。那么,这种矛盾冲突便只能在宋江超强个人意志的推动下延续下去,这份内心的痛苦也只能由他独自吞咽。他最终“成为一名孤独的殉道者。”^[5]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纵横家,还有土匪、江湖、市井等多种异质的文化因素并存于宋江的思维意识中,它们不能统一于“大道”而只能成为宋江的处世之术。因此,宋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生存环境显示出不同的人格,为奸为雄、为义为盗,都只不过是他的一个侧影。义士,盗魁,忠臣,奴才四种反差很大的角色集于一身而又杂糅渗透、前后贯通,就使得宋江的整个人格形象斑驳陆离,甚至难以分清究竟哪一种才是主色调。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源在于他自身思想性格的丰富和复杂,在于他的身上灌注了、活跃着许多对立的文化因素,宋江卓越的才能也因此陷入宿命般无法挣脱、无法冲出的浓重的黑雾里。

参考文献:

- [1] 王松江. 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2.
-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文明与缺憾[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164.
- [3]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2卷[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377.
- [4] 施耐庵, 罗贯中. 水浒全传[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 [5] 宋金民. 追求、孤独与殉道——《水浒传》宋江的性格特征[J]. 明清小说研究, 2011(1): 66-75.

责任编辑: 黄声波